

美國外交官 真面目

譯合中李明丁 著士女克布·爾蓓娜安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國 美
目 面 眞 官 交 外

著 七 女 克 布 • 爾 倍 娜 安
中 李 明 丁
譯 合

版 出 店 書 年 新 東 山

美國外交官眞面目

著者 安娜·蓓爾·布克女士

譯者 丁明 李中

出版者 山東 紅書屋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〇〇〇一—五〇〇〇

前言

過去的一年帶來了我一生中重大的事變。我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我愛我的國家，並且忠誠無貳地爲她服務，但是，在去年，我却決定要永遠定居在蘇聯了。這是一個我已經深知和熱愛的國家，雖然我在這裏只住了兩年。如果認爲這在我只是一個輕率的決定，那就錯了。我曾經長期而且苦惱地考慮過一切促使與反對我走上這一步的因素。如果我決定了前者，那是因爲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

對我採取不友好的態度的人在我個人的私生活中尋找我的動機，但，這是不合乎事實眞象的。實際上，這些動機是純粹客觀的。我所以作這樣的決定是因爲我逐漸認識到美國的統治階層正領導着美國與全世界走向一個可怕的慘境。

我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的，也不是受那些宣揚和平事業的人士與組織發出的演說與小冊子影響的結果。這是將近三年來，我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與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每天的工作與親身體驗中得出的結果。在華盛頓，同樣也在莫斯科，我看到對美國外交政策負責的美國外交家們用盡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來造成世界的災難。他們的政策現在是，而且過去一直就是在反對蘇聯；而蘇

聯，我現在懂得，過去和現在都是在阻止着他們這種破壞世界和平、反對全世界人民爲爭取幸福生活的鬥爭底陰謀。

這些外交家們深知正是蘇聯阻止了美國的富豪們征服世界。因此，他們當前的目標就是硬說蘇聯有侵略的野心來詆毀蘇聯，好證明他們自己對反蘇戰爭的準備確實有理。因爲，當我在國務院與莫斯科大使館工作期間，我漸漸認識到，這兩個組織的高級領導人的努力正是朝着這樣一個目的。

很顯然，我面臨了下一難題，是默不作聲與盲目地執行美國國務院與莫斯科美國大使館這批戰爭販子們的一切命令，因而使自己也負上一部分對世界人民的重大責任呢？還是大聲疾呼以反對他們可怖的活動呢？在大使館內要發出這種抗議，將無異於在曠野中叫喊一樣。因此就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步驟，這樣的步驟將能給我以有效地參加反戰爭販子的機會。爲此，就必須拋棄一切個人的與感情上的顧慮，這就是我所做了的。

我辭去了大使館的職務，並且決定留在蘇聯，在這裏，我可以盡我所能，參加爲世界和平繁榮的鬥爭。

這本書是依照我與某些人的廣泛接觸的經驗寫成的，美國人民期望這些人去保持和促進與一切國家（包括那在反對法西斯死敵中對人類作了不可估價的貢獻的蘇聯在內）的敦睦邦交，可是，我在國務院和莫斯科大使館中所目擊的活動，却與美

國人民的希望大相逕庭。我看見達摩克利斯的劍（註）正高懸在人類之上，其鋒刃正垂垂而下，威脅着千百萬的人民。

我不能沉默。

註：古代希臘敘拉古國王戴安尼修斯是個暴君，他曾經用一根頭髮，把一枝劍掛在他的臣子達摩克利斯頭上，命令他在下面吃飯，以懲罰他。

基本定價

人民幣 27 元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我在諜報機關中的工作	一
第二章	國務院的反蘇領導集團	二〇
第三章	我到了莫斯科	三六
第四章	美國大使館的諜報活動	五五
第五章	美國新聞處和美國的宣傳	六九
第六章	美國大使館的投機家	七六
第七章	美國統治者爲什麼正在飛舞大棒	九六
第八章	我對蘇聯的印象	一六一—一三三

第一章 我在諜報機關中的工作

我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附近的一個大家庭中誕生。我的父母同匹茲堡地區許許多多的居民一樣，是歐洲來的移民。他們是到這塊被稱爲『財富、自由與黃金般機會的土地』上尋求好一點的活路來的。

同其他到美國來的移民一樣，我的父母很快發現他們事實上是被『輸入』來供人剝削的。他們只是一種稱爲『廉價勞動』的商品，被買得他們的勞力的雇主同其他的工業原料一樣地處理着，正像他們在這個煤、鐵業中心用鐵礦砂與煤來製鋼一樣。

許多移民在這種可怕的剝削與無法無天的情況下無法活下去。有些幸運一點的回到歐洲去了，其他的大多數留了下來，終生作苦工。許多人死的時候像叫化子一樣。我的父母總算費了好大氣力活了下來，由於家裏作工的人手多，經營着匹茲堡附近的一個農場，這才過得漸漸寬裕起來。

我在高中畢業以後，就決定不顧一切困難，要受高等教育。美國是沒有政府對學生的獎學金制度的。因此，在我進匹茲堡大學以後，就必須化一部分時間工作，

而以工作所得來付學費與生活費用。與絕大多數美國大學生一樣，我不得不在我全部就學期間半工半讀。在若干過重的工作與時時耽心能否完成學業與能否得到工作的極端困難與動盪中過了四年之後，我離開了學校去找職業。

最初，我在各種工廠裏做一些臨時工作，戰時又在美國諜報機關工作。後來我被派到國務院工作，到戰爭結束時，又從那裏被派到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

這就是我簡單的經歷。它除了說明我只是成千萬作為歐洲移民的子孫的美國人而外，並沒有什麼重要，一億四千萬普通美國人，在許多方面與我有相同的出身和經驗。

我在美國所接觸的大批人們中，不論在家庭，學校，大學，或是在紐約與華盛頓的職業中，我發現很少人在其出身或當前生活中沒有遭受過辛酸與貧窮。

歐洲人通常對美國人的生活總存在這種觀念，好像在美國，每一個人經濟上都有保障，對將來都有信心，青年人生來都是無憂無慮而愉快的。而實際情形却不是這樣。

只有當我在華盛頓國務院與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時，我才接觸到在養尊處優的環境中長大的上層階級子弟。他們是屬於與我們這種佔全國大多數的人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世界裏的。

當然，因為我幾乎一生都生長在小康的環境之中，我在許多方面要比我同一代

的絕大多數的美國青年幸運得多。我沒有像我的許多早年就離開學校到匹茲堡區煤礦，銅廠，商店與工廠中工作的朋友和熟人一樣，他們現在仍然在這些礦山，工場、商店與工廠中，而終於設法受到了高等教育並且找到了『可敬的』工作。

在離開大學以後，我曾在私人的商行中作過一些時候的事，但這個工作根本不能使我滿意。我渴望能盡自己最大的力量來參加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湊巧，當時在美國空軍運輸司令部有一個情報工作的職位，我就接受了下來。

我在這個機關中的北大西洋組工作了一個時期，不久就又調到了美國主要諜報機關『戰略服務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簡稱OSS）的外籍美國公民部工作。

我的主要職務就是仔細研究在美國出版的外文雜誌與報紙，特別是斯拉夫文的刊物。我被派來寫關於美國各種斯拉夫特別是進步的團體的活動情況的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我必須提出如何利用這些團體來完成戰略服務局的情報工作任務的意見。

我認為我在美國諜報機關中工作真正有助於對人類公敵希特勒主義的鬥爭。我仇恨法西斯主義，我以爲在諜報機關工作乃是對法西斯瘟疫作鬥爭最好的方法。但是後來我就發現，我這種理想主義的想法太天真了。如所週知，美國諜報機關在戰時並沒有有效地與法西斯作戰，而戰後它們却採取了和以前也是現在的德國、意大

利與西班牙的間諜與反間諜機關全盤合作的政策。

當我在戰略服務局工作時，我逐漸熟悉並瞭解了這個被美國人稱作『笑裏藏刀』的間諜機關的歷史、職責與工作方法和方式的許多有趣的內幕。

戰略服務局的局長是威廉·鄧努萬將軍。他于一八八三年出生于紐約州的布法羅，後來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學院。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被派到法國，在美國遠征軍的騎兵中服役。鄧努萬是一個天主教徒，又是一個共和黨員。一九三二年他曾競選過紐約州長，慘遭失敗。

當戰略服務局的工作一開始，鄧努萬將軍就設法取得美國政府的信任。他很成功地用極狡黠的手腕使華爾街的反動力量能對這個組織直接起作用。

他所以能够這樣做，是由於羅斯福當時忙于籌劃美國戰爭事務。因此，鄧努萬就可以獨斷獨行地任命他這個諜報機關的高級人員。

鄧努萬請他的老同事與戰時的老夥伴來擔任主要的行政上的職務。其中有：G·E·布克斯頓上校；他與鄧努萬一起在一九一九年創辦了美國的法西斯團體美國退伍軍人會；阿瑟頓·李嘉茲，大規模進出口商夏威夷波羅密公司的董事長；J·S·摩根；華爾街喉舌『幸福』雜誌的愛爾摩·羅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華爾街的律師R·李佛摩爾等等。鄧努萬又給戰略服務局羅致了邱吉爾的一位表親雷蒙·蓋斯特；百萬富翁T·李揚的兒子；反動的紐約太陽報的老板比爾·

杜渥特；梅隆百萬金元的繼承人保羅·梅隆；還有舊俄沙皇時代的親王與將軍賽爾蓋·奧布倫斯基，他在進戰略服務局以前，生活十分窮困。

戰略服務局成立以後，鄧努萬就派他的代表四出搜集關於各國經濟情況的情報，其中很多都是裝作新聞記者出國去的。

在法國戰敗以後，鄧努萬就到法國去，以求確知她崩潰的原因。

鄧努萬回國以後，就充滿自信地報告美國政府說，法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有『第五縱隊』，也不是像美國駐法大使布立特與美國報紙所報告的那樣，是由於法國共產黨的活動，而是因為軍隊首領的無能與法國對近代戰爭的毫無準備。

不久以後，鄧努萬又訪問了巴爾幹與中東，也訪問了倫敦、開羅、雅典、貝爾格萊德、索菲亞，安哥拉與耶路撒冷，他這次旅行旨在為美國軍方搜集特別情報，同時也在視察在這些國家內的美國間諜組織。

當鄧努萬在阿爾及爾時，曾與魏剛將軍進行長時間的討論，因而完全了解了北非的情況。事實上，一九四〇年底美國人就在北非進行作戰準備，甚至在那時候就通過美國間諜組織與法國軍事當局建立起關係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鄧努萬在倫敦與英國經濟戰爭情報服務部的首腦們對在軸心國家與軸心佔領地區傳佈秘密宣傳的問題作過一次討論。雙方曾達成一項協議，這些宣傳必須能予這些國家中的親同盟國分子以道義上的支持，但同時又必須不讓他

們在對美國人與英國人有利的時機以前，對德國人發動武裝抵抗。在這次談判中，被佔領國家人民的利益是最後被考慮的。

戰略服務局靠利用歐洲人民仇恨法西斯，與這些國家內的地下抵抗團體建立了關係，把它自己的間諜打進這些團體，計劃利用它們在戰後為美國諜報機關服務。

當我在報紙上看到美國諜報機關在幾個月以前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法國參加反德抵抗運動的西班牙人的名單交給了法西斯西班牙的反間諜組織的消息時，我震驚到了極點。這就是美國報答對她有恩的游擊隊員們的方法，這對我極大的恥辱。

在戰略服務局工作中，我很快就發現，這個機關的主要間諜活動不只是針對着德國，而且也針對着蘇聯。

根據我許多的觀察，我可以確定地說，美國間諜組織的頭子們靠着戰時美國與蘇聯的同盟關係，而派遣他們的職業間諜人員滲入蘇聯境內，進行反對他們同盟國的間諜工作。這些間諜人員是以各種面貌派到蘇聯去的，有的裝作大使館參事，二等與三等秘書，參贊或是普通的書記，有的裝作軍事供應團與軍事參贊室的職員，最後是裝作美國報紙、雜誌與廣播公司的記者，或者裝作裝配租借物資的專家。

美國間諜機關的反蘇方針又可以由下一事實得到證實，即當戰時美國與蘇聯還並肩向法西斯德國作戰時，戰略情報局的蘇聯部即是該處第一大部，部長是一位哥

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叫做羅賓遜，他是美國公認的偉大的『蘇聯通』。

蘇聯部包括一些特別組，從事搜集蘇聯情報，如工業與軍火生產、人力資源、國民收入、對外貿易、農業等等。

從一開頭起，戰略服務局就認定對蘇間諜工作是頭等重要的工作。到戰爭行將結束時，戰略服務局更認為搜集關於蘇聯及其外交政策的秘密情報，搜集對蘇聯友好的民主國家的秘密情報，是極端重要的事情。

我確鑿地知道戰略服務局在倫敦的代表與英國、希臘與比利時的間諜人員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並且徵調了新的間諜，後者不但供給他們關於敵人的情報，還供給他們關於同盟國特別是蘇聯的情報。

舉例來說，戰略服務局在重慶的代表們就搜集着有關蘇聯的情報。一九四二年有一個戰略服務局的專員，以前當過白衛軍的白俄 I·托爾斯泰，被派到西藏，調查與蘇聯接壤的地區，並在這些地區內組織反蘇間諜活動。戰略服務局駐伊斯坦堡的機關，派間諜到德國去同時也派間諜到蘇聯去。

有時候，當適合美國司令部的利益時，戰略服務局也在德軍佔領區組織一些騷亂行動；但在更多的時候，他們就有意地阻止抵抗運動的生長，而導使它走上在戰略上對美國具有重要性的方向。我確鑿知道戰略服務局直到盟軍登陸歐洲之日以前，一直都在費盡心機阻止法國抵抗運動的興起。在暹羅的戰略服務局人員也是如此。

此，雖然抵抗運動的領袖們，對反對日本佔領軍的總起義已作了一切必要準備。

戰略服務局也在志願參加的美國人中組織了若干行動小組。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小組成爲歐洲與北非被佔領國家抵抗運動的「組織者」，它們在那裏建立了反動的地下組織。他們搜集情報，並在積極參加反對法國的人民陣線游擊隊員的鬥爭，特別是反對共產黨。他們只給戴高樂將軍以援助，而他則絲毫無可懷疑地執行一切美國的命令。

這樣，戰略服務局不僅在德軍後方搜集間諜情報，同時還對歐洲被佔領區進步力量作戰。

同樣的小組在對付日本的進步力量上也十分活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戰略服務局在暹羅留美學生中挑選了一批最忠實可靠的學生，送到特設的間諜學校去受訓。這批暹羅學生在那裏受了無線電通訊，破壞與游擊戰略的訓練。其後，這批人通過地下關係進入了暹羅，設法打進了抵抗運動的首腦部，並攫取了領導權。這樣就使後者幾乎完完全全地執行美國間諜機關的命令。

在戰時，根據美國政府與蔣介石締結的特別協定，在中國成立了一個中美合辦的間諜機關，叫作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簡稱 SACO），中美合作所的活動，是受戰略服務局指揮的。

美國間諜人員從蔣介石政府那裏得到充分的合作，美國海軍部的一項文告中曾提起過，歷史上從未有過兩個間諜機關如此密切合作的先例。

我可以發誓說，這兩個間諜機關的合作直到現在還在繼續。美國間諜繼續在其對蘇聯遠東邊疆的工作中利用着中國的特務機構。

當我在大使館工作期間，我注意到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間諜人員，乃是美國間諜人員積極的助手。

這樣，我們看到在崇高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中成立起來的間諜機關，如何在其反動的頭子，鄧努萬將軍及其華爾街伙伴們的領導下，轉變成爲專事訓練間諜人員與其他反蘇破壞活動的反動巢穴。

在戰時，鄧努萬與其他美國間諜機關的頭子們認爲與蘇聯的同盟關係純粹只是一種形式，雖然是必要的，但不是真誠的。他們企圖利用蘇聯人民當時所遭受的困難與艱辛而坐收漁人之利。他們焦急地期待蘇聯的削弱，希望在戰後可以逼迫這個偉大的國家屈膝。可惜他們悲慘地失望了。

但是，他們的失望並沒有給他們以什麼教訓。現在他們還抱着同樣的野心，顯然他們並沒有能在希特勒與法西斯德國所受的教訓中學到什麼好東西。